

老甄的故事

葛玉清 张文祥



清澈碧蓝的嫩江水静静地从齐齐哈尔市西侧流过，她不舍昼夜地将随流而下的泥沙推送到这里，终于堆积出一个4000公顷的江心岛屿。于是一座水草丰茂的天然草场形成，逐水草而居的各种禽鸟在这里栖息，野鹿、狍子、野兔们也把这里当成了乐园。牧民们将成群结队的牛羊撒在硕大的绿毯上。解放初期，“国营新中畜牧场”成立了，这里成为近千名职工生活劳作的绿色家园。

可是由于多年的过度养殖，草场植被不断缩小，加之毫无节制的沙石采挖，使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已是草场不再、沙丘遍布，禽鸟飞尽、兽类迁移。它惟一的功能就是毫无倦怠地为城市、乡村输送着遮天蔽日的沙尘。人们纷纷逃离几代人生活过的家园，辞掉曾经被人们羡慕的工作，到各地另谋生路。

甄殿举，这个喝着嫩江水长大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15年来，他凭着一股子傻劲和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执著，在江心岛抒写着意义人生，创造着一个个惊人的奇迹。

一天清晨，甄殿举从市政府大院门口路过，看到环卫工人拉着两车细沙土走出大门。

“不一会就扫这么多，整天扫也扫不完，这可咋整！”环卫工人一脸的无奈。

离市区仅仅一公里的江心岛上，一阵阵狂风卷起一张张沙幕，搅得天地浑黄一色，向人间显示着沙尘的力量。

这一夜，老甄怎么也睡不着。

“快别瞎寻思了，明天还得办房地产手续呢，再说治理风沙也不是个人能干的事儿。”妻子张桂荣劝说着。

“我不办了。”

“你说啥？傻了？疯了？”桂荣腾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摸摸他的头，说：“不发烧呀。”

“我想用开发房地产的钱治理江心岛。”看老甄说得认真，桂荣急了：“这可是把几十年的血本往里砸呀！咱这钱挣得容易吗？你没日没夜地在外跑，不是进深山林，就是下黑煤窑，可盼出个头了，你却……”

听着妻子的埋怨，老甄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1982年，甄殿举从部队转业到市建设局工作。是1987年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改变了老甄的生活，他亲眼目睹了茂密森林被狂风漫卷中的火魔吞噬的场景，心中永远也抹不去村庄、城镇化化为焦土的惨烈。经过森警、干部群众30多个昼夜的奋战和几近生死的考验，大火扑灭了，可是如何处理那130万公顷横七竖八散发着特殊味道的焦木，成了炙手的问题。于是专家们决定：尽快让焦木下山，进行补救！

甄殿举作为大兴安岭重建工作的副指挥，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如何恢复重建的事。这时朋友那里传来急需煤矿支顶巷木的信息。老甄硬是说服了爱人和老母亲，辞去了公职，索性住在了大兴安岭的深山里，组织工人整理废木，清理山林，补栽树木。当一车车整理好的架子木运到各地煤矿，架起一道道地下长廊的时候，第一桶金终于在老甄面前出现了。几年下来，他从事的各种贸易做得也很顺畅，资金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2003年正是他事业蒸蒸日上时，他却要上江心岛治沙。

这让家人怎么能接受呢？朋友们也劝他：“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得顺沙子跑了。”

十冬腊月的一天，老甄站在江边想心事。一团团黄草被寒风吹着乱跑，也推着人们从封冻的冰面上过江，锅碗瓢盆铺盖卷儿在马车、驴车上乱晃悠。

“咋的！真的往出搬？”老甄问过江人。

“哎！祖祖辈辈住的地方，不想搬，可没饭吃咋整？”

“这岛成了鸟都不拉屎的地方，留不住人啦。”

乡亲们的话一锤锤打在他心上，“豁出去了，不把这沙滩治好我就不姓甄！”

甄殿举要治理江心岛的消息一时间成了头条新闻，“这回老甄可成了真傻子。”

一天晚上，老母亲把他叫到床前：“这么多年，干啥事我都依着你，听人说你干了件大傻事，快说说你这是咋啦？”

在80多岁的老母亲面前老甄倒出了心里话：“过去您教育我们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善事。是国家的好政策和大兴安岭那些好朋友的帮助我才有了今天，可这么多年老百姓让沙子折腾得不安生，如果把江心岛治理好了，我们鹤城就真成留下仙鹤的好地方了。”

“孩子你说的对，你是国家培养的人，不管干什么都要把这个大家摆在头里。好好干吧。”

得到母亲的鼓励、妻子的支持，老甄感觉有了坚强的后盾。

荒岛上，几十棵歪歪斜斜地站立着的百年老榆树，仿佛显示着它们的坚强。

“认输可不是我老甄的性格。”

正当他准备撸起胳膊大干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几乎把他打倒：相濡以沫20多年的妻子乳腺癌晚期。

江边，他久久徘徊。夜晚他跑到医院与妻子讲出了心里话：“我一定把给你治病的钱留足，剩下的……”

“我知道你要说啥”，妻子眼含泪水，“你是定了的主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就依着你吧。”

两年里他挤出时间陪着妻子跑遍了祖国各地的大医院，采取了最先进的医疗手段，但是都没能得到根治。

“咱不治了，回家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妻子哀求。

这年初春，老甄回到他梦牵魂绕的江心岛。他买了几台大型推土机，到泰来县又买了200多万株的树苗，把舍不得离岛的十几个老乡组织起来，推沙包、栽树同时进行。劳动队伍也逐渐扩大到200多人，大家有模有样地干了大半年，沙包推平了不少，可是大部分树苗成了小干柴火，这让老甄心急如焚。

他到老副市长、造林模范王树清家请教，老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看沙地、查水情、选树种，江心岛也成了老市长放心不下的地方。

“小黑杨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得经过削枝、育苗的过程。”老市长手把手地教，耐心指导，让老甄茅塞顿开。

于是他又买来100万株小黑杨树苗，按照老市长的指点，钢钎钻眼插入树苗底，清水灌注。有了植树新方法，大家干得起劲。

那几个月，每天中午老甄都是不顾一切地往家奔，他要做好的饭端到桂荣床头。一天，妻子对他说：“我和你一起上岛吧，可别这么跑了。”于是，他带着几箱方便面、榨菜，推着桂荣坐着的轮椅进岛了。

一天清晨，老甄还和往常一样在前边栽，捡拾着后面扔过来的树苗。可是过了一会怎么没有了动静？他回头一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桂荣手攥着一把树苗，整个人扑倒在地。

栽树的人们围拢过来抹眼泪。

2004年4月17日，桂荣走的第4天，老甄把小儿子送到妹妹家，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运动将在江心岛展开。鹤城民众被老甄的事迹感动，附近部队的3000名官兵开着100多辆汽车来了，市里四大班子的领导们率领着干部职工们来了，老甄早已订购好的300万棵树木运来了，植树大军带着几千把铁锹、几

百副水桶来了，几十台运水车来了，几条渡船穿梭般地往来于江面……

狂风扬沙示威，人们睁不开眼睛，屏住呼吸不敢讲话，耳朵里灌进来的全是沙子与风的呜呜，需要交流时只能在汽车前盖的沙土层上写字。

经过近半个月的大会战，300多万株树苗在江心岛安了家。这让老甄喜出望外。他每天都要到新栽的树苗地里看看。可是小树该冒芽的时候，存活率只有20%。老甄拔出一根根柴火棍，擦干泪水，直起腰杆，“死多少我就补多少，不信它不活”。他组织了200多人的补栽队伍，没黑没白天地干起来。

一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检查栽树的质量，不知不觉中踉踉跄跄来到妻子和他最后栽树的地方，一屁股坐在沙地上，腰如折了般疼痛：“桂荣呀，我真的干不动啦。”泪水夺眶而出……

突然，他看到一排排小树苗长出了茶叶尖尖似的新叶，“我们的树苗活了！”这喊声像是对妻子的告慰，更像是对荒岛变绿洲的呼唤。

江心岛的变化带来事业的发展，2009年经黑龙江省林业厅批准成立了“齐齐哈尔市新中林场”，老甄任场长，也成了江心岛的当家人。十多年前离开岛的人们回来了，在外打工的青年人回到家乡，成为公司的员工，每天开着汽车来岛上上班的城里人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江心岛有树的蔽护，植被慢慢掩盖了黄沙，每一点点变化都给老甄带来不尽的喜悦。可是要让偌大一个沙岛彻底改变模样还有多少事情等着他。

“向荒岛要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也是这个硬汉子的誓言。

他买来3条平板船和加厚钢板，架起一座牢固的浮桥，打开了江心岛与外界的通道。他大胆提出打造江心岛人工湿地、沙漠上造水田的设计。他又买了100多台大型机械，这个车队陆陆续续浩浩荡荡地开进江心岛。近千个沙坑被彻底填平，36公里长、5米宽的水渠纵横将稻田分割成无数个田字。阡陌交错，尽是轰轰而过忙碌奔驰的工程车、运输车。他从外地买来60多万立方黑土，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经过近3年的艰苦打拼投资6000多万元，硬是开发出1万多亩水浇稻田。如今江心岛生产的稻花香、珍珠米、长粒香被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予“绿色食品A级产品标志”，4000多亩水稻获得有机食品认证。

为打造现代农业旅游观光示范基地、发展林下经济和原生态养殖业，老甄带着各部门经理到吉林省长白山周围几个县实地考察，很快5000多亩无公害有机药材基地建成，黄芪、防风、板兰根、甘草等药材落户江心岛，经过三家知名药业公司生产厂商考察认定为药材基地；近亿只林蛙在杨树林的草地上安了家；500栋蔬菜大棚、100栋温室大棚、上千只大雁；500亩果蔬基地、100万尾江鱼成了岛上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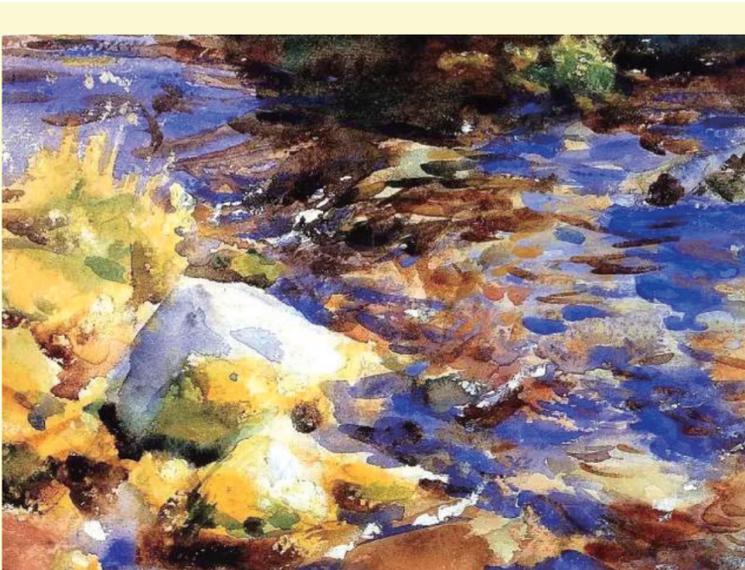
在江心岛的北部，一个大小不一被绿草包裹着的墩子如碧珠散落，在细流中浸泡，人们给这些披着绿草的墩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塔头墩。由于湿地逐渐扩大，2014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齐齐哈尔江心岛国家湿地公园。为了这个城市的后花园，老甄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湿地注水、清淤，还建设了度假、娱乐的江心岛服务中心和儿童水上乐园。

江心岛北岛的84岁李玉兰老人说：“殿举把这岛看成自己的家，把树看成自己的命，把我们都当亲人。多少个年三十他们都是和乡亲们荒岛上过，我腿摔骨折是殿举送来了看病钱……”这是李玉兰老人向人们一遍遍述说的内容。

“他是一个只会付出，不讲回报的人”，人们这样评价老甄。在齐齐哈尔市有一座“龙康甄馨老年家园”，是9年前获得政府批准，老甄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来的，先后有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院长孙岐说：“为了让老人们吃好、住好，老甄每年都要为敬老院补贴几十万元。”天冷了，他牵挂着暖气热不热，快过年了，他早早让人把肉、菜送过去，得知哪位老人有病了，再忙也要赶到医院看望……有一年，不知从哪儿传来要拆楼搬迁的消息，宋长荣、于永芝、郭玉兰等十几位老人搂着、拽着老甄哭：“我们不走，要往哪儿搬，我们就跟你到哪儿！”

今年61岁的老甄，觉得在这岛上还有干不完的事业，有画不完的蓝图。

时代楷模



萨金特作品

新天

世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又一次来到淮安，拜访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感慨万千。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高中毕业前不久的1月9日早晨，我正在吃早饭准备上学，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惊闻噩耗后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思考周总理怎么就不回老家淮安看看呢？66年，哪怕一次，哪怕顺带也好。

是太忙太忙吗？是的，但也不全是。

1958年7月，淮安县委副书记王汝祥去北京见周总理时发出邀请：“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呀。”对家乡人的邀请，周总理点了点头。他感慨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他微笑着给王汝祥讲了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1960年春，淮安县委去北京看望周总理。其间，周总理不但回忆了童年生活的情景，而且仔细地关切询问：“文渠呢，还有水吗？”“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并满怀深情地谈及淮安城里的东岳庙、三思桥、骑马巷。

1939年春天，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踏着抗日硝烟来到我国东南前哨的浙江开展抗日活动。3月28日至31日，他以“到绍兴祭祖”为掩护，与浙江地下党组织联系布置革命工作。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1946年的一次采访中周恩来对记者说：“我已经36年没回过家了。估计母亲坟前已经杂草丛生了吧。”当时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离淮安近在咫尺，他是有机会回淮安的。

1950年1月，他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回忆道：“那时我就很想从南京回到淮安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克制住浓浓的思乡之情，没有回去。他说：“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当时国家还十分不太平，蒋介石极有可能会引发内战。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关注。一旦内战真的爆发，那亲人的安全肯定会受到威胁和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他还在咫尺而未回口思夜想的淮安，没到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是出于对家乡亲人安全的考虑和不给基层组织添麻烦。

1949年后，周恩来仍然一直未回淮安。1958年曾盛传周总理要回淮安看看，于是当地官方拓宽了南大街，又将周总理记忆中的镇淮楼改造成独栋的楼宇。周恩来的秘书王伏林回忆也说：“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淮安，思念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俯瞰淮安后的周总理回到座位，一言未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淮安的变化不大，大运河、（文峰）宝塔、镇淮楼都还在，只有南大街好像变宽了。”

少年时就有报国大志、乳名“大鸾”的周恩来，在修身课上接受校长点名提问时就清晰而坚定地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言，他此一生也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施展自己的抱负、践行自己的诺言。

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表妹万贞时，万贞的副子钟则朱曾问他为什么不回去。周总理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1963年7月22日，周总理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总理在京现代副座谈会上时说：“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生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说他是我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总理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周总理不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骑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以致周恩寿夫妻到死后，把骨灰葬到淮安才得以“回家”。

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委人民委员会：“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来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杨氏儿媳，周尔辉之母）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不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80岁的杨氏病逝后，周恩来收到了县人委的汇报与办理杨氏后事的费用单据后，于1957年4月19日又写信给县人委：“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我伯母家现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寄给，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现寄去安葬我伯母费用所欠垫款25元，请查收。”

1961年，淮安县委送了一些藕粉、莲子、工艺品、针织品等家乡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信上写道：“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藕粉等的偿付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以后有便再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周恩来虽然衣锦未还乡，但是家乡人民敬重他，也理解他。

衣锦未还乡

施建石